

上诉理由

〔苏联〕阿·茹科夫 等著



上诉理由

〔苏联〕阿·茹科夫等著

王士燮等译

外国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北京

上 诉 理 由

Shangsu Liyou

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 数 286,000 开 本 787×1092 毫 米 $\frac{1}{32}$ 印 张 15 插 页 2

1987 年 7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7 年 7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

印 数 0,001—4,950

书 号 10208·260 定 价 2.55 元

目 次

弗拉基米尔·马卡宁

在天空跟群山相连的地方 王士双译 (1)

阿纳托利·茹科夫

上诉理由 刁绍华 赵静男译 (82)

尤里·雷特海乌

正眼看人 王士双译 (255)

弗拉基米尔·田德里亚科夫

生死攸关的一天 罗萍 黎明译 周爱琦校 (387)

在天空跟群山相连的地方

弗拉基米尔·马卡宁

弗拉基米尔·马卡宁(1940年生)，毕业于哈尔科夫铁道学院，曾任大学数学教师，现住莫斯科。六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，处女作为自传性小说《直线》(1965)。他的创作以中短篇为主，已出版的小说集有《老镇的故事》、《围绕肖像所发生的事》(1978)、《克留恰列夫和阿里穆什金》(1979)、《在冬天的道路上》、《在大城市里》(1980)等。见诸刊物的中篇还有《蓝的和红的》、《业余消遣》、《湍急的河流》、《士兵和士兵的妻子》等。

马卡宁是“四十岁一代作家”的代表人物，被称为“文学中契诃夫流派的直接继承者”。他的作品刻意求新，具有浪漫色彩，笔调明快多姿。

《在天空跟群山相连的地方》发表于一九八四年。小说描写一位作曲家巴希洛夫为报答小镇对他的养育之恩，为复兴家乡的“歌和音乐”，为“探寻歌曲的废墟”，曾先后三次回到故乡，但人们对他的态度一次比一次冷淡，最后，他怀着不被人理解的痛苦、委屈、震惊和愤怒，默默地告别了小镇。

作品含蓄、深沉，反映了人情世态的变化。

格奥尔吉·巴希洛夫想回家，他想安静一下，他很想回到他那间叫做书房的房间，坐在摇椅上晃呀晃呀。但他们是在别人家做客；周围的人又借着醉意唱起歌来——这是普通的歌，原始而粗野的歌，是那种当你想大喊大叫时就唱起来的歌。于是巴希洛夫又开始皱眉咧嘴，然后用双手抱住头：他是不是堵住了耳朵，耳朵眼儿，以免他那精细的听觉被这萍水相逢的人的歌声所损伤？由于优美旋律在音乐主题中的作用减弱，多种多样的语言因素便在音乐中得到合乎逻辑的发展。然而旋律结构刚一接触歌唱和念白之间的界限，马上就会受到嘲笑，您知道，这可太过分了！……可是作曲家的妻子偏偏解释说：格奥尔吉·巴希洛夫并没因为他们唱歌而生气，也没受到损伤，相反，他是感到内疚。是的，是的，请你们想想，作曲家诞生在一个遥远的镇子里，离这儿总有一千公里，那里的人，也就是说他的乡亲根本不唱歌了，他为此而感到内疚。

“……他觉得也很惭愧。”妻子压低声音说。

“可为什么呢？”客人们悄声问。有几个人仍然扯嗓子唱着。

“不必介意。请大家唱吧……”

大家回头望望：他坐在大餐桌旁，抱着头，陷入长时间的沉默。他已经五十开外了。半小时之前，他还有说有笑，

善于交际，谈起话来不乏魅力。有人用手指弹着一只还剩半瓶酒的酒瓶。周围的人有一部分认为，这位音乐家在做客时喝多了点；这是常有的事。的确是这样，巴希洛夫一喝酒，就更痛苦了，时时显得愁眉苦脸，但整个席面上却响成一片，人们高声唱着快活的歌儿。有一次他抽噎起来，妻子马上把他带回家；他这次就是这样走的，被妻子搀扶着，用手捂着白发苍苍的头。原来他并没堵耳朵。他一喝酒就仿佛觉得他对家乡的罪过不但历历可见，而且非常大，他为了自己的罪过等待着惩罚，而这种惩罚很可能来自上天，因此他想捂住头——怕挨打。

“一方面是他，另一方面是歌曲的作者，他们通力合作，于是整个过程就延续下去。但是我却为此而苦恼。”巴希洛夫反复对自己说，猜想有一天在深夜的静寂和黑暗里会响起婴儿高亢、纯正的声音。

家乡的镇子非常小，可以一览无余，围着它走一圈也不费什么事，尤其在夏天。修这个镇子不但是为了热裂法的正常生产过程，而且为了消灭经常发生的火灾，只是规模似乎太小了。一栋，两栋，三栋——总共只有三栋房子，形成一个“П”字，开口朝着小山上遥遥可见的工厂。要是打比方的话，三栋房子好象是个捕鼠的笼子，同时又是个灵敏的张开的耳朵，把工厂里一切事故的嘈杂和声音都吸收进来；这个镇子就是为了排除事故的。三栋房子后面是一带低矮的小山。

山背后有一座小城，离镇子大约有二十五到三十公里，从这儿看不见，所以它似乎根本不存在——对小巴希洛夫说来，这座小城好长时间只是神话，就象地理上的南方或者比方说西方一样，似乎存在，又似乎不存在。“城市？……在哪儿？”小巴希洛夫问，人们回答他，“在那儿。”于是指着小山的方向。

工厂的自动化程度很高，但工厂是旧式的，所以常常失火，而且可以预知火灾的发生。在工厂干活的有二十个工人，一个技术员和一个工程师，还有一个安全技术员和一个安全工程师——由于人员少，而且可以互相代替，所以他们实际上都是安全人员。妇女也做工，连小孩和老人在内，小镇上大约住有一百人。

“山上什么也不生长，唉，山上什么也不生长——长……”小镇与世隔绝的生活，往往就决定了人们对从前、对已往的日子、对生了青苔的乌拉尔民歌的怀念，乌拉尔民歌散发着病痛，矿井和探索者敏锐的（如果不说是狼一样的）劳动的强烈气息，而且常常就直截了当地歌唱抢劫。阿瓦里镇人坐在长餐桌旁，一边喝酒，一边唱，而童年的想象当然会为他增添绚丽的色彩，使他们在小男孩的心目中变成高大的人，变成巨人，其实可以想见，他们是普通人，衣着褴褛，身上油渍麻花，沾满煤烟子，他们不住抽烟和咳痰，把他们在工厂上班时吸到肺里的煤烟都咳出来。巴希洛夫很小，可他们都非常高大。群山和楼房都非常高大。“П”字中间的空地，叫做“院心”，总是阳光灿烂，热得灼人，但槭树有阴凉，

于是就在树荫里修了三个公用的长餐桌，桌腿埋进地里，旁边放着长凳。

城里有两个老师来到镇上呆了一两个月，所有的科目一齐教：“小家伙，把这个抄下来……”换个科目：“小家伙把这个念念……”用指甲划出从哪儿到哪儿，所以巴希洛夫现在还清楚记得老师的指甲的样子——男老师的指甲象小锹一样结实，女老师的指甲又薄又秀气，从里面透出乳汁般的光泽。给镇子里各种年龄的儿童都讲二年级的课程，马上又突然改成五年级、三年级、甚至七年级的课程。但他们学得并不太坏。况且这群孩子都相当有毅力，而巴希洛夫是个孤儿，这使他的毅力更带有特殊的色彩。他的父母是在一次事故中被烧死的，当时他只有八岁，是的，八岁，住在舅舅家里，舅舅供他吃，供他喝，供他穿，是呀，是呀，舅舅供他吃，供他喝，供他穿，还供他上城里音乐学校念书的学费——一切就是这样。然而当他刚一突破乌拉尔群山静静的圈子，这象柔软的手按在喉咙上一样平静而且别有一种柔情的圈子，来到首都，开始靠助学金（哪怕很少一点点）学习的时候，他就不再接受他们的帮助了。他不愿意那样做。他连一个戈比也不花他们的了。这时舅舅也烧死了，而给镇上其他关心他的命运的人写得很少的书信中，他每次都干脆而坚决地回答说，他有钱花，因为在中等音乐专科学校里领取助学金，他反复用粗笔体写着“助学金”三个字，直到它们起到作用，令人信服为止，而书信并未停止。

跟他同岁的根卡·科舍廖夫也算一个；根卡·科舍廖夫在父母跟前总是吊儿郎当，谁也不能把他跟巴希洛夫相比。小镇的音乐天才似乎很多，但只有他们两个成了音乐家。况且小镇真愿意放他们走吗？他们俩不是走出来的，而是跑出来的。就是在火车车厢里，他也没感到缺少歌声。他感到一片寂静。而车轮的哐当声仍然是一种节奏。

在巴希洛夫的记忆里，刀叉声、女人刮那三张大餐桌时发出的有节奏的咯吱声、用装六升水的大铜杯往桌上泼水的声音和顺着桌子滴的水的流动声，都是相似的，而他当时太小了。他伸长了脖子，但也够不到桌面，看不见这些象箭一样向四外奔流的小河。他只看见往下淌的水怎样流下来：流着流着就从桌上落到地下。咯吱——吱！咯吱——吱！阿琳娜大婶把刀刃立着，两手按住刀背，一块桌面一块桌面地刮，直到桌子刮白了，刮干净了，适合办丧席为止。桌上不蒙桌布。小巴希洛夫也要坐在桌旁——人家叫他来，他跟根卡·科舍廖夫是每次必到和专门邀请的，另外再找两个，好让他们的童声织进成年人的歌声中去。

唱歌也是一种事儿。也许，他正是出于儿童的职业心理才没象别的孩子常干的那样，跑到山里去，藏在那儿，躲上一天一夜，因为他知道办治丧席，要他唱歌。父母的死是另一回事，被一条细线跟这丧席分开了，尽管这丧席是他们的，是为追悼他们而办的。他没有藏起他那纯正、优美的嗓音。当酒喝了很多，菜也吃了很多之后，身材高大的阿瓦里镇人唱起父亲心爱的歌儿，他用自己纯正的嗓音领着他们：他唱

得不快不慢，跟平时一样，领着他们平稳地唱下去，只是唱到成年人拔不上去的高音，他才停顿一下，等待第二男高音的支援和合唱。或者回头望望：他们忘了没有？……马上就会把手风琴递给他，他要是拉好了，他们会放声大哭。他们一唱歌很容易落泪，因为这些阿瓦里镇人的泪腺被煤烟和化学物品弄得脆弱了，落几颗眼泪没什么奇怪的。

那一天傍晚起了风，风不大，但一阵一阵挺猛，吊在摆满食物的桌子上的灯摇摇晃晃。摇晃的灯光不时落到科舍廖夫家和科罗利家坐的长凳上，他们后面坐着格鲁尼娜母女俩——老瓦西莉萨和小瓦西莉萨。酒装在透亮的大玻璃瓶子里。旁边是个装腌西红柿的盘子，西红柿象又红又大的圆球。满满一盘土豆冒着热气，煮鸡蛋也摆得满满的。

大家回想父亲的死，但争论特别厉害的还是母亲——她在临死之前究竟想说什么？

父亲全身烧坏了，当时就死了，母亲却还喘着气。把她送到城里医院的时候，她突然清醒了，兴奋地说起话来，说得非常非常快。有人只听懂了她要求派人找她的亲人——于是马上坐车回镇找她的哥哥，等他——小巴希洛夫的舅舅——来到之后，母亲已经死了。“什么？您想说什么？快说，快说！”医生催促她，但母亲咬紧牙关，等待亲人来，管他是好是坏，总是亲人嘛。但她没能把她要说的话对医生和周围的人说出来。

“现在只好猜了！……我们就猜吧。”谢尔盖·维克托

罗维奇·科罗利跟老太婆达里娅伤心地碰了杯，互相吻过。

这时大家都响亮地碰杯，然后探身吻小诺尔卡·巴希洛夫，可他厌恶他们身上那股气味，这是工厂失火之后人人身上都有的气味，尤其是被火烧着的人。不用说，他的父母也有这股味，尽管根本没让他靠近他们。

工厂厂房不高。它平坦坦地散布在从这里开始的草原上，在这平坦、静止的工厂中，最引人注目的是活动的东西，向上升起的滚滚浓烟。阳光灿烂，槭树下面的桌上摆着食物，妈妈和爸爸已经埋葬了——应该拉手风琴。大清早，周围的人在喝酒唱歌——应该拉手风琴。小男孩儿把头俯在手风琴上，周围这些被火烧着、喝得醉醺醺的人们突然一起说起话来，他们向他解释说，从来没有人象他拉得这么好。他们还说，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己的才能，他们吻他，把他搂得紧紧的，要是抬起眼睛，会看见在平坦坦的工厂上空弥漫着一团团滚动的红烟。

在阴雨天，或者北方在寒冷的秋天以及冬天，阿瓦里镇人就聚在叶列明家里。这家人家日子过得热闹，没什么讲究，房间里没有间壁，所以很容易一下子就搭起跟外面一样大的桌子。要是巴希洛夫跟唱歌的孩子们朝着一排窗子坐着，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到一团团微微颤动的煤烟。有一次在丧席上他看到了还没完全扑灭的火。烟是黑的，弥漫成一片。民歌成分的复杂变换过程从那时已经开始了，后来时间起了作用：不同风格的彼此顽强渗透，本身就决定了跟当代音乐表现手法的融合。

妻子说，近几年他好象变得脾气古怪了，是的，是的，跟年龄有关系，是的，是的，尤其是过了五十岁之后，尤其是当摇椅变成他最喜爱的创作音乐的地方。如果窗前有几个醉汉突然唱起歌来，如果其中哪怕有一个嗓子好，巴希洛夫就会扑到窗子跟前，打开窗户，听那古里古怪的歌唱——竟然兴奋得不得了。他的情绪多变，就象天气变化一样突然。醉汉们沿着自己的快活的道路远去了，而作曲家一整天都坐立不安，根本不能工作：既不能作曲，甚至不能听音乐。“他们不唱歌了……他们连在丧席上也不唱了。”巴希洛夫自己叨咕着，嘟哝着。如果家里有人，比方说儿子，想跟他谈谈，他就跟你顶牛儿，突然把你大骂一顿，把嗓子喊哑了，然后躲进书房，锁上门。他坐在摇椅上，但并不摇晃。他可以这样坐上好长时间，用双手抱住头，仿佛他心中有巨大的痛苦，仿佛他遇到不幸。有时还拿进去一瓶酒，在那儿闷闷不乐地喝着，幸亏这样的时候很少。有时家里人能听到，他在喝完酒之后，或许就在喝酒当中放声痛哭。

妻子讲，一整天就这样过去了，到了半夜巴希洛夫一定来到已经躺在床上的妻子身边，把头偎在她身上，悄声地说：

“你也知道，我在乡亲面前是有罪的，我有罪呀。”

“我知道，亲爱的。”

妻子温存地抚摩着他的头。妻子安慰他：跟他谈音乐。悲歌虽然脱离了丧席，却保留在他的大提琴奏鸣曲里了。旋律线的悲歌式颤音向来是他最拿手的地方，不光是他为音乐做出了贡献，音乐也给予他很多东西。

阿瓦里镇人不仅在丧席上唱歌，而且在生小孩时唱歌，在很少有的婚礼上唱歌，在节日里唱歌，在星期天唱歌，或者没有缘由，只是因为寂寞而唱歌，一唱就是一晚上。倒也是，凡是黄昏时候，因为寂寞而唱歌的，大半是女人：她们并不那么需要他那副好嗓子。然而当小巴希洛夫只有三岁的时候，在刮得干干净净的桌子底下开始学走路的时候，镇上人唱歌也不需要他来参加。当他只有两岁或一岁的时候，他们也唱歌。当他没出生的时候，他们也唱歌。

镇上的人都有一副挺不错的嗓子；惟一显然被上帝遗漏下的人是小傻子瓦西克——他跟小格奥尔吉截然不同，格奥尔吉的嗓子比起镇上的人还要好得多。瓦西克是个私生子，在这儿举目无亲，寄居在格鲁宁家里；这家人家可怜他，供他吃，供他喝，他在小镇上象天空的鸟儿一样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，不用干活，受到保护，真是幸福的人。他惟一遭到拒绝的是唱歌。由于镇上每一个人都会唱，嗓子可能好一点儿或差一点儿，大家一唱起歌来，不幸的瓦西克马上就感到痛苦。他一步步地往唱歌的人堆靠近。歌声渐渐让他入迷，但他心里却非常难过，他一张开嘴，马上又闭上，他知道嗓子不好不让唱，不许可唱。折磨着瓦西克的愿望与其说是想唱歌，不如说是想跟大家一样，想跟大家在一

起，终于走到紧跟前了；他发出一种拖长的哞哞声，一种从腹内憋出来的粗浊声音，蹦到槭树底下的桌子跟前，在那里唱歌的人开头用手指吓唬他，后来就用拳头：“闭嘴！……喂，他要是不愿意闭嘴就把他撵走！”

他被赶跑了，而小巴希洛夫一直唱呀，唱呀，越唱越响亮——他的眼睛睁得很大，看得清楚；他并不停止唱歌，却又看到瓦西克向前靠近的整个步骤：瓦西克先是悄悄地往前移动，在稍远的地方停下，然后又偷偷靠前，想暗地里不出声地学唱。他只是不住地翕动着嘴唇。但是由于瓦西克把劲儿憋在肚子里，两只胳膊抽搐起来，手掌来回乱翻，臂肘一弯一弯的，后来抽搐往上传，传到脸上——脸上掠过一阵极其复杂的痉挛、微小的抽搐和挤眉弄眼的动作。哑了的心灵虽有要倾吐的感情，却没有表达的手段。小巴希洛夫依然唱着；他跟镇上的人一样，只管唱歌，并不去想小傻子的事。遇到雨天或冷天坐在叶列明家里的时候，哞哞乱叫的瓦西克第一次来就被撵跑了，从此再也没让他进门。

小巴希洛夫的嗓音纯正而坚定，即或有人走到跟前或有人走开，对他都毫无影响。他唱得轻松、自然，就象他平时呼吸一样。他一边唱，还能一边微笑，或做出搔痒痒的无谓动作，但他的脸仍然安详，声音仍然纯正。后来他进入现实音乐领域，由于学得成熟而变得复杂，感情不大外露，但在童年时代，他在音乐方面最拿手的特点，至少也是最突出的特点，则是自然。他拉手风琴的时间很长，对于人们的来往往往很来去习以为常：他们来了就吃，就喝酒，走了之

后再回来，坐在他身旁，被感动得直落泪。问题显然不仅仅在于他们的泪腺受过损伤。

他们送他进城入音乐学校，替他付学费，当他的舅舅也被烧死之后，他们又凑钱送他进了莫斯科中等音乐专科学校。阿赫登斯基是镇上头一个大力士，美男子，有一副优美的男低音，他把孩子送到首都。阿赫登斯基唱歌，起音总起得很低很低，好象从远处传来的：外面的夜色多么黑——黑——黑……他担任领唱，而且是公认的歌手，一到高音就喘不上气来，但他的花腔放得开，唱得大胆。他是不为人知的歌曲创作者：无名氏。他虽然长得力大无比，却并不是样样通，有些活计他不会做，所以在火车上他对年少的格奥尔吉谆谆教导，教给他生活经验：他教的是他并不了解的莫斯科生活的经验。他身上带着不少钱，都是镇上人凑的，他很节省，准备给格奥尔吉存着，好替他向哪位富有的老太婆租个住处。阿赫登斯基不知道，学校里有供外地人居住的宿舍；这对他说来真是件意想不到的大喜事。

为了安安静静地跟少年谈谈生活，他把少年带进火车上的一个单间，免得他东张西望：

“在莫斯科，格奥尔吉，主要是花零钱最容易把钱花光，变成穷光蛋：象喝汽水，吃冰糕。一个人要是怎么也管不住自己，花钱就象流水似的。你可不要有这个毛病——小心点儿！”

阿赫登斯基在什么站也不下火车，这是因为害怕有人

在半路上把他拖到什么地方，诈他的钱。他挑战似的断然拒绝跟非常和气的乘客打扑克，其实他们并不赌钱。

到了莫斯科，阿赫登斯基一下子被啤酒打动了，啤酒的味道和酒后袭来的那种特别的微醺，使他半天清醒不过来，但他在啤酒店喝酒怎么也不许自己一次超过一杯。他欢喜得大叫起来，对少年人说：“你呀，格奥尔吉，长大了就会明白！你会明白，会相中啤酒的，不用猜，你一定会相中的！……”格奥尔吉不吭声，他不会交谈，也不懂得啤酒：太年轻了！格奥尔吉在入学考试时，不断遭到挫折，幸亏他的听觉好，有音乐天赋，还由于主考的老师不反对从他们根本没听说过的内地招个学生。他考试考得很久，很顽强，有股犟劲儿，而在这些日子里，阿赫登斯基对他的分数和啤酒都赞不绝口。他常到不远的啤酒店里喝酒。啤酒店播放音乐，有电唱机，那时这东西很少见，电唱机播放的华尔兹，也令阿赫登斯基赞叹不已。

听说宿舍不但供学生考试时住，而且可供学生在学习期间居住，阿赫登斯基明白他的任务完成了，不禁如释重负，便用剩下的钱喝起酒来。他一连三天三夜没离开播放音乐的啤酒店，等他从啤酒店出来时，嗓子已喝哑了。他脸上现出非常惊异的神色。他摊开双手。他说话声音哑哑，带着明显的糠鼻子味，他很希望这病能好。

过了一年或一年半，格奥尔吉接到来自那里的难得的一封信，从被时间筛选过的小镇故事中，透露出阿赫登斯基的消息：原来大力士永远倒了嗓子。那可是个纯正的男低